

每一个人都知道知识能改变命运。每一个人都知道要有知识，就必须读书。父母再穷，也都在做一个梦，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过得比自己好。可是这个梦能实现吗？
可怜天下父母心！可怜做穷人难！可怜做穷人的孩子不容易！

穷人的孩子咋上学

我所居住的昆明是省会城市，我知道这个城市里最累、最脏、最没人愿意干的活儿都让农村涌进城市里的打工仔、打工妹给包下来了。他们给人当保姆，给人掏下水道，给人修马桶，给人清洗油烟机，给人擦皮鞋。大街上他们蹬着三轮给人拉货，把我们三个人不能抬起的重物一个人背到七层楼上，还要时时提防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对他们处以罚款。到餐馆里吃饭，我们坐在那里喝酒聊天吆喝，他们毕恭毕敬守候在一旁，服侍客人，打扫杯盘狼藉的餐具。建筑工地就更多了，简直可以说是打工仔用他们的双手，为我们盖起高楼大厦，让我们享受。宾馆里是他们忙碌的身影，因为有他们的付出，我们得以住上整洁干净的房间。到夜总会、歌舞厅，也是打工仔在为我们引路，保证营业的秩序，打工妹在为我们端茶倒水，对我们陪笑脸，甚至陪客人唱歌让客人高兴。在这个城市，没有打工仔、没有打工妹就没有城市的干净，没有城市的美丽，没有城市的繁荣。

我所说的是不是事实，你们掂量掂量。

全国的城市，没有不留下打工仔足迹的地方。没有打工妹不愿意干的被人瞧不起的工作。可是有谁关心过这些从农村到城市里来打工的人的生存环境？有谁关心过他们的子女？有谁想过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夹缝中挣扎生存？

由于一个偶然的機會，我得以看见农村到城市里务工的人是多么的艰难，他们的孩子又是多么地可怜，甚至到了读书的年纪，还没有学费来上学。

那是 21 世纪到来的夏天，我因为办事到一所小学校，正好碰上家长带领小学生们注册。有一群孩子，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城里务工人员的子女，他们中穿得较整齐一些的，已经报了名，家长的手里都拿着一张收据和一份申请。收据写的是收到某某交来的一学期赞助费 600 元。申请是统一打印好的，写的是某某自愿赞助 800 元给学校，作为爱心助学的一点心意，下面都有本人的签名。

这再简单不过了，没有什么违法违纪的地方，符合社会都来支持办学的精神。可是问题就在这里，我问我所随便碰到的手里拿着这样的收据和这样的申请的人，他们没有谁说是自愿的。

其中有一对夫妇领着儿子来报名，我问男人：“你交的是什么费用？”

他答：“借读费。”

我说：“你的收据不是写着是赞助费吗？而且我看你还写了申请，是自愿的。”

这个湖南来的打工仔说：“不自愿不行呀，我们是外来人口，娃娃读书要交借读费。你看嘛，申请都是学校印好的，我只管签个名就是。”

打工仔的老婆站在一旁，她接着男人的话说：“除了借读费，还要另外交 240 元，这是买书的包括课本，这个才叫学费。”

就是说这次报名，这对夫妇交 1040 元，孩子才能走进学校读书。我碰到的这个学校是收费最便宜的了，条件好的学校，借读的学生一次要交两三万元，别说外来的务工家庭子女，就是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市民，如果父母有下岗的或者是低收入的家庭，都别想让子女跨进条件好的学校学习。

也许这点儿钱对一些富有的人来说，只不过是抽几盒高档香烟、喝一瓶洋酒、进一顿餐馆、到宾馆开个房间的花费。可是你知道这对农村来务工的夫妇是靠什么收入的吗？男人白天在一个修理厂干活，夜里骑辆旧双轮摩托车拉客，他说，有时拉到深夜一两点能挣二三十元，还不要遇上警察和客运管理的，要被抓住了一罚款，几天的辛苦就泡汤了。他们夫妇在城郊结合部租了间 10 多平方米的房子住，自来水和厕所都是公用的。女人就在路边摆了台缝纫机，给路过的人缝缝补补。他们说自己有两个儿子，今天来报名的是大孩子，已经 8 岁多了，去年因为没有钱就耽搁了孩子一年。小的孩子还在家里上幼儿园，小胡同里有人办了个幼儿园，收的都是打工仔的子女，一个月连吃喝 100 元，几间房子，破破旧旧的几条小凳子，有个阿姨照看孩子就是。想起来这大概又是一所黑幼儿园，可是湖南来的夫妇说，没有这所幼儿园，他们的孩子还不知道往哪儿送呢！

这对夫妇不算是最穷的，比他们还穷的，孩子就上不了这样的学校了，只能到办学条件更差的学校或者是私立学校去读书了。当然这里说的私立学校不是“贵族”学校，而是那些专为穷孩子开的环境和条件都差得多的学校。

报纸上登出过一条消息，“父母苦求女儿为弟弟辍学”。冯德林夫妻是腰街镇的农民，农忙时夫妇一块儿在地里干活，农闲时，冯德林就到新平县城里去打工。他们的女儿冯艳 16 岁了，身患疾病，闲在家里。冯艳也曾读过书，因为腿不好走，还是妈妈背她上的学。可是读到小学三年级那年，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，加上弟弟也需要上学，爸爸妈妈只好含着眼泪求女儿辍学。小冯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所曾经让她快乐的学校。再过几天，腰街镇的一家糖厂就要来小冯艳的村子里收甘蔗了，腰街镇因为这家糖厂，很多人都种了甘蔗，因此，邻近的乡镇都管这个镇叫甘蔗镇。收甘蔗前，冯德林夫妇几乎每天到要到甘蔗地里去转转，冯德林说：“这几天已经有人上门来催债了，我都快急疯了。等过几天卖完甘蔗后，一部分钱要用于还债，还得留点钱给艳儿治病，这日子过得苦哦！”

尽管父亲忙了农活还要到城里去打工，尽管母亲披星戴月累得灵魂出窍，身患疾病的冯艳还是躲不过失学的命运，她别说读书，就是看病都没钱。这就是穷人的孩子，他们又怎么能妄想进名牌大学，到哈佛去念书？

禄劝县金沙江畔贫困山村的彝族农民张惠达 2001 年来到昆明，他带着两个儿子，心里只有一个愿望，打工挣钱，让孩子读书。在太和翻砂厂，他找到一份在铸造车间的工作。三年过去了，他把两个孩子送进一所私立民工子弟学校上学。尽管民工子弟学校收费比公立学校便宜得多，张惠达还是支撑不住上涨的学费，两个孩子面临失学了。张惠达不得不写信向《都市时报》求救，他说：“别让我的孩子失学。”

我是一个来自禄劝汤郎乡封边村的农民，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3 年前，妻子因病离开人世。家中剩下年迈的老母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。读书不多的我深知道，再苦再累也不能穷孩子。为了供孩子上学，别无选择的我只身一人带着孩子来到昆明，靠着打工挣来的一点钱供两个儿子上学和赡养着老母亲。

我没有多少文化，也没有一技之长。我做的是又苦又累的重活计，工资很少，根本无法缴纳孩子的学费和赡养家中的老母亲。虽然目前还没有到无米下锅的地步，但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。每当睡在床上，我的脑子里老在想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让孩子辍学。如果那样，可能可以解决当前的困难，但这样却害了下一代，害了我的孩子。抚养孩子本应该是每个父亲的责任，作为父亲的我感到十分地惭愧，因为我连自己的孩子也都供养不起，我将要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失学，回到那贫困的山村去种地，孩子将成为同我一样没有文化的人。这样就意味着我们祖祖辈辈都要穷下去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十分地不愿意。

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鼓起勇气，拿起已多少年都没有用的笔，把我的真实故事写给你们。希望报社能够关心我的孩子，伸出援助的手，助孩子完成学业，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。

记者到张惠达的家，那是一个 10 平方米的小出租屋，屋里摆着一张高低床，床上连被子都没有，只有一些塑料纸和几件破衣服。一家三口，就在这张床上睡觉。张惠达的大儿子叫张学化，10 岁。他和弟弟知道父亲送自己上学不容易，学习都很努力，期末考试，他考了第一名，弟弟考了全班第三名。

张学化的班主任告诉记者，张学化这个孩子很懂事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简陋的墙上挂着两张奖状，张惠达告诉记者，一张是大儿子的，一张是小儿子的。他说：“当两个儿子拿着奖状回来时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这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。每天回到家里，看到墙上的奖状，再苦再累，我顿时感到舒坦了许多。”可是就是这样两个孩子，因为交不起学费已经面临失学了。

“能帮帮我吗？我真的好想上学！”大点的孩子张学化这样对记者说。

小的那个男孩叫张学鹏，6 岁，他抱住记者的腿，说的是：“等我将来长大，我一定报答你，我用我挣的钱给你买糖吃。”他还对记者天真地做了个鬼脸。

我还知道一个四川来的妇女，她的丈夫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，她在一家餐馆做小工。两个人租了一间 20 平方米的房子生活，生了个儿子。孩子送进一所公办小学读一年级时，丈夫在一次意外中失踪，这位妇女独自抚养孩子。每到一个新的学期开学，她都要为孩子的学费奔波，有时为借点钱求爹爹告奶奶。她找到些白纸给孩子订作业本，孩子在这样的作业本上做作业，交给老师，老师不收，说破坏了学校的形象。校方说，孩子经常不能按时交学费。在班里孩子受到歧视，有一天他回来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想读书了。我去讨饭吧，我吃不上早点，在课堂上饿得头发昏。”

在五年级开学的时候，这个孩子终于因为没有学费失学了。孩子如他所说的，真的离家出走了。他到哪儿去了？去干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母亲到处找他，听小伙伴说在这个城市的乞丐堆里见过这个孩子，难道他真的去做乞丐了？

这就是我们制定的义务教育一个也不能少！纸上的法律条文我们已经写了，可是怎么来保证落实？有什么具体的保障让每个穷孩子都不失学？

迄今为止，我们出版了许多谈教育的书，他们基本上都是写给富人看的。因为这些书里出谋划策要人实现的那些措施，都是要既有钱又有时间去陪着孩子“练摊儿”的。一个为生活四处奔波的人，一个下岗就像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时时刻刻悬在头上的人，一个干最重、最脏、最累而挣到的钱仅仅能够糊口的人，能指望自己的孩子去在“家里的运动场锻炼身体”，在晚饭后有父母陪着打桥牌开发智力，打开冰箱

拿出冰块握在手掌里 15 分钟,练练意志力吗?太奢侈了吧?穷人的孩子只能望洋兴叹。既然如此,我们还是搞“精英教育”好了,反正“做大官”毕竟官位有限,“挣大钱”毕竟大款很稀少,让有钱人的孩子去开发智力,锻炼意志,应付考试,用最优秀的成绩考进名牌大学,到美国去读哈佛。我们就别再玩什么“一个也不能少”之类的把戏了!因为就在我们社会的最底层,有数量众多的一个群体,他们挣扎得是多么艰难,他们的孩子没钱读书,他们的孩子因为吃不起早点饿得头昏(当然我们的孩子天天喝牛奶,有的还为肥胖而发愁),请别忘记这个事实!

孔子说: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?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?”孔子还说: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孔子告戒:“财聚则民散,财散则民聚。”孔子还怒斥:“与其有聚敛之臣,宁有盗臣!”

现在我们的贫富两级分化已经到了富者一掷千金,贫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富人的孩子挑着学校上,穷人的孩子没有书可读。富人的孩子进了名牌学校,还要到国外留学,穷人的孩子失学,流浪街头。如今你到发廊,到夜总会,到那些可能有暗娼的场所,卖淫的女孩总是穷人的孩子,嫖客大都是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,是钱花也花不完只好拿着钞票作践的富豪。富人玩弄的大都是穷人,穷人的孩子怎么挣扎也逃不脱悲惨的命运。人是生而平等的,何以在我们的土地上,至此这么不平等?

难道我们就只看得见“莺歌燕舞”,看不见暗藏的危机吗?为什么有人练“法轮功”?为什么传销总是“死灰复燃”?为什么社会道德沦丧?我们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在做“学问”,为什么不研究研究这是为什么?

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,弱势群体有什么保障?巴西新当选的总统卢拉是工人出身的,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对人民说:“我和我这一届政府的任务,就是要让每一个巴西人都吃得上早餐、午餐和晚餐。要让我们人民生活得好,让世界民主。”他的演说没有豪言壮语,说的都是实话,他赢得了人民的信任。

让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饭,而不是让有的人富得流油,有的人却在饿肚子;让每一个人都能进学校读书,而不是让学校变成培养富人子弟的工具,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教育。

新华网发布上海民工子女读书难的报道:“每天清晨,当我路过附近一所公办初中时,总是禁不住往校园里多看几眼,我真羡慕城市的孩子能上这样好的学校。”这是上海新泾镇霍邱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樊涛对记者说的话。

樊涛是这所民办学校的六年级学生。他说:“我想进公办学校,但是我是‘打工族’的后代,原级安徽颖上教育部门对我们一放了之,漠不关心。上海认为我们是外来人,也是另眼相看,我们像是没爹没娘的孩子。”

眼看即将小学毕业,樊涛马上面临着升初中的问题,这可难倒了一家人。在上海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办初中,但是要进公办中学门槛儿太高,借读费昂贵,一般 3 年要缴 4 万至 5 万元,对于打工的家庭,根本无法承担。如果不能在上海读初中,樊涛只能让妈妈带着他回老家读书,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,又将面临分别。

樊涛今年 15 岁,满脸疤痕,不久前父母一清早忙于开包子店顾不上他,他不小心把放在冰箱上的热水瓶打翻了,造成大面积烫伤。去年 10 月,他 66 岁的爷爷因胃癌病逝,医疗费花了 4 万多元。今年 6 月他母亲切肉时不小心,造成 4 根手指头

骨折，治疗费花了 4000 多元。因经济困难，樊涛六年级这学期的学费 480 元只缴了 100 元。

樊涛的家乡凡庄村人均年收入仅 500 元，是贫困村。尽管家庭经济困难，樊涛始终没有放弃读初中的愿望，这学期期中考试，他的语文、数学两门成绩在全班 54 名学生中名列第三。范涛说：“如果在上海读不了初中，我就在上海打工，决不回老家。”

樊涛的父亲说：“我期望孩子不要像我一样，今后以打工为生。希望他能够走出穷山沟，考取名牌大学，将来过上都市白领的生活，这也是我当初来上海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”

像樊涛这样的民工子女，上海有很多。据霍邱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刘铎华介绍，仅新泾镇的民工子弟小学去年就有 200 多名毕业生因经济困难不能在上海读初中而留在上海打工，他们卖菜、做临时工、做家务，只要能糊口什么都干。

记者在新泾镇唐家宅，见到去年小学毕业没能进初中而辍学的彭雨莲。这个女孩子穿着破旧，人却挺机灵。她告诉记者，父母从安徽六安县到上海来打工，至今快 20 年了，她出生在上海，上海可以说是她的第二故乡。因没能进初中读书，她每天靠捡废品挣 10 多元钱为生。

尽管如此，彭雨莲仍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学校。彭雨莲的妈妈说：“即使捡垃圾、做乞丐，也要省吃俭用，让女儿起码能读到初中毕业。”

打工族的子女在上海读初中，除了学费还要缴高额的借读费。在长宁区侯家角，一位姓杨的民工告诉记者，他的女儿为了能进附近一所公办初中读书，托了熟人还要一次性缴借读费 6000 元。

现在许多城市发文件，宣布要给民工子女市民“待遇”，让民工子弟能就近上学读书。有的城市还宣称要免除民工子弟的“借读费”。事实上重重叠叠的障碍和关卡依然存在，学校变个名目、变个法子照样收你的钱“没商量”。观念不变、体制不变，钻进钱眼儿里的道德不变，其奈我何？

每一个人都知道知识能改变命运。每一个人都知道要有知识，就必须读书。父母再穷，也都在做一个梦，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过得比自己好。可是这个梦能实现吗？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！可怜做穷人难！可怜做穷人的孩子不容易！

查阅资料显示，在发达国家，对富人是课以重税的，而对穷人是给予退税补贴的，为的就是缩小两极分化。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进学校读书。穷人病了，可以住进不花钱的公立医院。实行这些措施的立法，并不是在这些国家已经很富裕的时期才做，而是在他们的发展时期就考虑得比较完善了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？因为国情不同，富人富得流油了，还什么福利都要享受。穷人穷得揭不开锅，还什么都要你出钱。富人买东西可以打折，富人病了，有公费可以支付，富人的孩子进学校，可以得到优待，有的学校还打出广告，理直气壮地说：我们就是要为富人服务。所以我们办贵族学校。我们让穷孩子流落街头。

如果这样的现实没有改变，我们的义务教育法希望的，让中国适龄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的设想就不可能实现，我们所说的让孩子都能读上书，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。难道我们对这样的现状能够无动于衷吗？